

宗教文化出版社

ONE

EARTH

(美)保罗·尼特 Paul F. Knitter ◆ 著

王志成 思竹 王红梅 ◆ 译

MANY

Multifaith Dialogue & Global Responsibility

RELIGIONS

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

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

根据 Orbis Books 1995 年英文版译出

根据 Orbis Books 1995 年英文版译出

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

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

ONE EARTH MANY RELIGIONS

(美)保罗·尼特 Paul F. Knitter ◆ 著
王志成 思竹 王红梅 ◆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

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

(美)保罗·尼特 著

王志成 思竹 王红梅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美)尼特著;王志成,思竹,王红梅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3

ISBN 7-80123-475-8

I. 一... II. ①尼... ②王... ③思... ④王... III. 宗教—问题—研究—世界
IV. B9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0824 号

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

(美)保罗·尼特 著

王志成 思竹 王红梅 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10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123-475-8/B·121

定 价: 22.00 元



作者致中国读者

我对本书中文版的感激根植于该书的主题和目的。以下各章所提出的建议可以概括为三点：

● 这个巨大星球上的所有宗教共同体都有道德义务伸出手来解决那些威胁我们整个地球生物之福祉的、扼杀生命的难题。

● 这一道德义务是共同的，它不仅存在于所有人之中，而且所有人必须一道来承担。如果对贫穷、暴力、生态破坏这些可怕问题的宗教回应能够有希望提上议程并让政治和知识分子的领导者们严肃地对待的话，它必须成为一个宗教间的回应。

● 如果世界各个宗教确实聚在一起，并且一起合作和行动以解决这些地球的、生态的难题，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新的或许是无法想像的机会，彼此可以学习和相互理解。宗教间伦理行动导致宗教间对话。一起行动会变成一道对



话。

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假设。我不能想到一个比中国更好的检验这个假设的地方了。我这样说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点，它们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和当前的处境中看到。

多元宗教的中国文化

正如我们经常观察到的那样，“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这样典型的西方问题可能会让本土中国人无法回答。他们觉得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十分困难——主要因为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多的是在宗教间发展起来的。（即使在多宗教的印度，其中的一种宗教——印度教已经明显地支配着其他的宗教。）在百家争鸣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文化和宗教思想形成的战国时期，儒家（教）和道家（教）一开始就在同一时期形成，几个世纪之后，也就是西汉末年，佛教也加入。在这些宗教共同体中，虽然有很多的不一致，并且经常有正面的冲突和未遂的镇压，但是每个传统不同的价值观、图景和道德精神都已经融进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的主流中去了，并且这么多世纪以来，这个趋势还一直继续着。

中国这个宗教多元的国家，在她过去两千年就已经成了一个宗教间共存的国家。中国的宗教传统似乎并没有呆在他们自己的后院里。他们已经开始了彼此的会谈，尽管这种会谈经常是含蓄的、没有意识的、无心的。对话和相互作用形成并影响着中国人看待世界和在世界中活动的方

式。今天,那些称自己有宗教信仰的(甚至那些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都是宗教的混血儿。他们不像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并没有在惟一宗教模式中成长。虽然某一个特殊的中国男人和女人可以证明他们主要的宗教世界观是儒教的或是佛教的,但是他们都不是纯粹的儒教徒或者佛教徒。中国宗教生活的这种混合特质就表达在中国的“三教”观念中。“三教”即儒教、道教和佛教。同一个体在不同的生活背景下可以同时接受儒道佛。

这种宗教多元性和共存性不仅标志着,而且也丰富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以生动的实例体现了荷兰天主教神学家施雷贝克(Edward Schillebeeckx)仅仅在理论上宣称的思想:世界诸宗教联系在一起比它们当中任何一个都能表现出更多的真理。中国的宗教差异性如何丰富其文化的例子对其他国家也同样重要,尤其是在当前世界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当然,包括中国)在不毁坏差异性的同时努力去建立差异性的统一。我希望本书能够帮助中国在重新理解和展现宗教差异性方面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然后让这个例子发出更为耀眼的光芒。

中国的宗教实用主义

中国对那些变得过分宗教化的宗教总是十分警惕。主要原因是受到了孔子的影响,孔子所关心的是怎样让社会运作得更为顺利和有效,中国对出世宗教从来就不满意。对于中国人来说,那种不能对此世言说和对日常生活没有意义的宗教是不能够要求他们对它忠诚的。他们严肃地对待



孔子的警告，即我们不应该让自己被那些关于天堂的虚幻的问题所困扰，以致我们忘了处理世间的紧迫问题；从比较近的问题着手有助于我们阐明或者回答那些关于天堂的问题。对老庄来说，真道无名；道无处不在——甚至在尿溺中都可以找到。中国的灵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一个此世的进程和产物。超越者可以在物质的内在性和精神性领域发现。

这也是本书的主题。尤其在世界当前处境中，人类已经把自己赶进了一个生态自杀和人类自杀的死角，而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如果世界宗教不能够提供一个帮助、治疗和引导的办法来帮助人类走出这个死角的话，生态和人类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所以人们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求助于宗教。中国看来是赞同耶稣的这句话的：“通过它们所结的果子，你可以知道它们。”通过伦理的、此世的果子，我们能够知道并评价宗教究竟是什么。

因此，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证实、阐明并扩展本书的主题——我们这个受威胁的地球正给世界诸宗教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我相信中国一定可以告诉世界如何严肃对待那些挑战和机遇。

中国和国家间的和平

中国读者能看到本书而让我感到高兴的另一个原因是发生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事件，这个原因让人感到奇特和悲伤。那天发生的事情和在美国所引起的反响已经动摇了在各个国家中所取得的和平的成就和希望。随着新的战

争被宣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全都宣称是为了战胜邪恶的战争，9.11事件使得各个国家的人民看来更难以在和平中生活。

我们居住在这样一个暴力导致暴力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一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团体正在宣称它们从事的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因为它来自上帝，并且是上帝要求他们为了善而战胜邪恶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如历史上常有的那样，宗教很容易被用来为暴力辩护并强化暴力。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尤其在9.11事件之后，孔汉思(Hans Küng)有名的格言道出了强有力的真理和紧迫性：“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国家间的和平。”和以前相比，来自世界各国的不同宗教传统却彼此联合在一起的宗教徒好像更应该提醒和警告这些战争团体：所有宗教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字不是仇恨而是爱，不是暴力而是同情，不是报复而是理解。当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它们的防卫和攻击武器系统时，当它们继续试图通过权力去提高和取得安全保障时，看来只有世界诸宗教拥有智慧，这种智慧告诉我们，持久的和平和可靠的安全不是建立在更多的枪支和更高的墙上，而是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之上，同情呼吁着正义。然而，世界各国可能会用古罗马的话来声明：“*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如果你要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吧。”而宗教则相反：“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促进人们爱吧，爱呼吁着正义。”除非所有人都远离了饥饿，没有人能摆脱炸弹的恐怖而感到安全。

如果中国利用它的文化和宗教的差异性和宗教实用主义而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以及关于这一信息的活生生的例子，那么世界将会发生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啊。毫



无疑问，假使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不断增强，在未来的十年里，它将在世界舞台上起到更大的作用：在地理—政治的讨论和国际共同体中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如果中国对世界大家庭的贡献不仅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睿智，还有宗教间和谐与合作，那么我们的世界一定会有更大的和平，或者说是更大和平的潜力。正如孔汉思所预言的那样，如果在中国的宗教共同体之间，以及在他们和世界宗教共同体之间，有更大范围的对话——全球责任的对话，那么在各个国家之间将会有更大的和平。我再次希望本书能对那些将他们的生活植根于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起到一点绵薄之力，能够帮助他们更加协调地促进对话。如果能够那样发生的话，我们的世界将会更加和平。

王志成教授努力促成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他承担了有关翻译的一切安排，并且潜心于艰巨的翻译工作，对此我尤其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他的工作能够结出丰富的果实！

保罗·尼特
于美国沙勿略大学



前言

孔汉思

前言

我很高兴为我的朋友和同事保罗·尼特 (Paul Knitter) 的这本新书撰写前言,这出于两个理由。首先,我很看重在我们的关系中早已感受到的坦率和诚实。在这本书中,尼特对我们之间存在的神学差异根本不是沉默不语,我们不时地将它们公开表达。我一直坚持,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即使是与其他宗教人士对话,也必须为耶稣基督的规范性与终结性,即把耶稣基督视为上帝对基督徒的启示事件作辩护,然而这并没有作出优越于其他宗教的傲慢宣称。依我之见,我这样做是更好地服务了宗教间对话这一事业,如我在从《做基督徒》(1974年)到《全球责任》(1991年)的所有书中所做的,即坚守这样一个信念,认为基督徒只能“有条件地”(也就是受耶稣基督的规范的制约)接受其他宗教的真理宣称,就如其他宗教人士只能有条件地接受基督教的真理宣称一样。然而,尼特表示,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跨过神学上



的“卢比孔河”。在注意到我们之间的这些差异时，我根本没有减少我感到的与一个朋友和同事的团结。相反，我在表达对我们的友谊不可缺少的诚实与坦率。

不过，耶稣的“惟一性”这一具体问题并不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尼特告诉我们，他会在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更细致地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对此可以期待。所以，在检阅《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的内容和意图时，我发现我全然支持。这是我为什么很高兴撰写这一前言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理由。

关于本书，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它不是一部毫无结果的象牙塔神学。在发展他的理论性的基础工作时，在对其他神学家的提议表示异议时，在遵循神学学术之程序时，尼特也使人明白，此书是作为个人的、精神性的“奥德赛”的一部分来撰写的，他在生存论上为千百万人可怕的苦难所震惊。该书能够非常动人地让人理解如尼特所描述的为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进行的个人奋斗，以及促进和指导这一奋斗的人与事。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只有持续地“在途中”的人才能真正为他人的苦难所影响；只有生命还没有“完结”的人对他人传记中的不完全性、断裂性和缺陷能够作出回应。

所以，尼特以一个自传性导言开始本书是很明智的。它向读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感觉，让人明白这个人是谁。他的道路代表全世界无数基督徒神学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尼特一代的许多神学家都感到他们自己局限于中世纪的、反宗教改革的、反现代的宣教神学模式之中。他们被引导到这样一种观点上，即非基督教的世界完全是一个巨大的没

有被皈依的异教徒的聚集地，假如没有人在他们去世之前给他们施洗，从而把他们引入惟一的拯救之中介，即天主教会，他们就会堕入地狱。尼特动人地描述了他早期作为一名宣教团体成员的足迹，以及一度促使他前去宣教的宣教模式痛苦的解体。在这一点上，梵二会议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并且提出一个新的范式：它承认在其他人所追随的宗教道路中有种种拯救之可能，还肯定非基督教的“真理”与“神圣”、价值与美德。尼特严肃看待这一新的神学范式，并作为一个在德国做研究的美国年青神学家，对所有类型的天主教和新教神学作了明确的批评，这些神学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排外主义的宣教神学。

但是，尼特继续前进。他不久就认识到，他不能仅仅发展一种关于其他宗教的神学，而是必须在与它们的个人相遇中从事神学任务。他的道路非常清楚地表明，现今任何一个从事宗教间对话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对话伙伴，他们不仅追随不同的宗教和文化道路，而且处于非常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中。这尤其符合亚洲的情况，尼特的宗教间经验就是首先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产生的。

这样的相遇将这位学院神学家引向一种有益的转变。他认识到，当宗教间对话在亚洲语境中“当场”发生时，当它变成与特定人的生活条件非常具体的遭遇（实际上是对抗）时，这些生活条件不可能处于对话之外。对话会失去所有道德上的可信性，假如它仅仅处于理智的或精神的层次，远离社会的悲惨境遇和千百万人的身心痛苦。本书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它热情洋溢地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宗教间对话所包含的不只是一种理智-学术上的兴趣，关心印度



教、佛教或伊斯兰教在特定的神学或人类学问题上会说什么。当然,细致的科学研究和强有力的学术分析对于宗教间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话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和动机,当它产生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认识到千百万下层人、边缘人的苦难,他们甚至被剥夺了最低的人权和尊严。政治或社会的受害者确实如尼特所要求的,“在信仰间对话中”必须有“一个特许的声音”。

所以,该书的顶点恰好在最后一章。尼特在其中叙述了他在印度从事宗教间对话的具体经验,他把印度正确地称为“对话的实验室”。读者实际上会发现这一部分特别迷人,这不仅因为它提供了有关庙宇、基层社区、对话中心和各种各样的活动团体的重要信息,而且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无价的“觉悟和启发之源”。宗教间对话的贯彻,一如“行动的对话”与“生活的对话”,对具体地方的具体人有非常具体的现实。我们在此发现了真正的希望之迹象,而这在一部控诉人类苦难和环境灾难的书上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尼特以描述特定的对话项目与行动计划来结束该书同样是很明智的,因为该书强调现实和对苦难的坚持很容易让读者气馁。这一危险通过书末所传达的鼓励与希望,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最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我分享保罗·尼特的信念,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必须着手处理“全球伦理”和“全球责任”的问题,就如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在其最后的“世界伦理宣言”中所做的。只有当世界各宗教共同体都能一起认识到一个最低限度的价值观、规范、基本原则和理念基础时,世界才会有更大的和平和正义。代之以划清界限(那样就为基要主义者



前言

和狂热者留下空间),世界各宗教必须肯定它们一起工作的责任,一起为更加广泛的公正、更加深层的和平,以及与生态系统更加可持续的关系而工作。在我自己的神学努力中,我以自己的方式尝试去做,但没有如尼特所做的,坚持把苦难的现实作为宗教间对话的惟一基础和合法性。解放神学的主要支持者也已认识到并正努力平衡“优先选择穷人”的片面性,以他们的神学方法对整个文化处境予以更大的关注。但是,对这样的问题每个神学家都会有他或她特别的侧重点。不同观点在分享共同目标时彼此补充。这一目标就是接受这惟一的世界,在其中许多宗教尽管肯定它们自己的真理宣称,但也都肯定它们各自有责任为通向一个共同的全球伦理而工作。为此,我希望保罗·尼特的书会得到许多读者的回应。



序

序

向所有站在这本书背后的和之中的人们一一致谢，这对读者来说恐怕就像做圣人连祷一样，既鼓舞人心，又令人厌倦。所以不列出在这本书上帮助过我的所有圣男圣女，而让我在“博士、圣徒、殉道者”的不同类目中都只提一二个有代表性的，他们曾以不同方式帮助我阐述、澄清和纠正此书的观点，即关于一种诸宗教相互关联的、对全球负责的对话。

或许我要向我的学生们致以最深的谢意，他们既有对不明确的或不真实的神学谈论表示厌烦的极好能力，又具肯定和扩充触动和挑战他们生活的宗教观念的浓烈兴趣。我特别想到萨拉·汉布鲁克 (Sarah Hambrook)、戴维·舒纳 (David Shurna) 以及宗教和生态正义的沙勿略学者研讨班，他们为本书的初稿出力甚多；研究生唐·孔克尔 (Don Kunkel)，他在我指导下作研究，同样出过力；莱斯利·海博



尔 (Leslie Heybore)、保罗·纳加诺 (Paul Nagano) 以及我在伯克利研究生神学协会的夏季班上的其他学生, 他们鼓励了我, 也曾为我的不明晰和胆怯责备过我。我也从学界的同事那里得到鼓励, 他们阅读了此书的早期形式, 如乔·布拉肯 (Joe Bracken, S. J.) 和罗杰·海特 (Roger Haight, S. J.), 他们一直在敦促我, 还有如加文·德科斯特 (Gavin D'Costa)、和卡尔-约瑟夫·库舍尔 (Karl-Josef Kuschel), 他们曾为我的方向和速度担心。对孔汉思, 我在多方面都要感谢他——为了他呼吁诸宗教负起全球责任的前驱性工作, 为了他为此书写序, 也为了我们的友谊, 这友谊不是不顾反而是因为我们的差异而更加增长。

印度母亲在最后一章说话, 但她在此书中自始至终都临在一样, 正如自我 1991 年第一次拜访她以后一直在我生命中临在。我要感激许多人, 是他们把我介绍给她, 引导我对她产生既爱慕又敬畏的感情, 特别是联合神学院 (UTC, 班加罗尔) 的学生和全体教员, 在那里我和我的家人受到盛情款待, 还有毗德亚约蒂 (德里)、泰米尔纳德邦神学校 (TTS, 马杜赖)、古鲁库尔路德宗神学校 (马德拉斯) 和达磨拉姆学院 (班加罗尔) 的学生和教员, 我曾访问这些地方, 并常常延长逗留时间。在印度几乎处处都有人以其智慧和忠告慎重而又真诚地、富有对话精神地接待过我, 如斯坦利·萨马莎 (Stanley Samartha, UTC)、塞缪尔·雷扬 (Samuel Rayan, S. J., 毗德亚约蒂)、约蒂·萨伊 (Jyoti Sahi, 班加罗尔)、甘加达兰 (S. Gangadaran, TTS)、伊斯雷尔·塞尔瓦纳亚加姆 (Israel Selvanayagam, TTS)、德瓦萨哈亚姆 (V. Devasahayam, Gurukul)、伊格内修斯·普西阿